



旅途中的教会：圣经、神学与历史透视

李雋  <https://orcid.org/0009-0007-6578-8037>

澳洲华人教牧神学院

摘要：自梵帝岗第二次大会开始，“旅途中的教会”这概念再次受到重视。本文从圣经、神学与历史角度，剖析“旅途中的教会”的圣经基础，神学取向，以及在历史中的应用。虽然“旅途中的教会”与其他教会模型的分别，但其圣经的基础并不足以将这概念界定成稳定的概念，在历史中的应用也显示有不同的诠释取向，所以，这一理念作为教会的理解仍然有其不足之处。

关键词：旅途中的教会、朝圣、教会模型

DOI: [http://dx.doi.org/10.29635/JRCC.202406_\(22\).0011](http://dx.doi.org/10.29635/JRCC.202406_(22).0011)

引言

按照在伦敦东部从事十多年教会植堂的斯图亚特·莫瑞 (Stuart Murray) 描述，后现代社会中的教会，与君士坦丁建立的“基督王国” (Christendom) 大相径庭，君士坦丁寻求一统天下，在四世纪主教们的配合下，基督王国有自身的一套社会规范和文化模式，这种王国的模式不看重各地场景的差异，只想将一个中央集权锁定的礼仪、信条和制度加诸所统领的各处。高度一致的标准将一切异议看为异端和分裂，并加以逼害。过去数十年世界各地的教会，在后现代



的思潮下，却拥抱多元、变化和文化差异。很多不同模式的教会出现，并且尝试更新敬拜、团契和宣教的模式，希望可以接触社会不同的人群。这些作新尝试的教会强调谦卑、开放，甚至承认自己的软弱，与大一统的基督王国绝然不同。这些教会不再追求人数的增长，而是更看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鼓励成员平等地、弹性地参与教会。¹

在这个大趋势之下，有不少对教会模式的反省和建议出现，其中包括液态教会、异类侨居者。² 这些模式或教会概念同样强调教会的流动和多变，看重教会在历史中的转变多于对某一传统的传承，而其中一个值得探讨的概念是“旅途中的教会”，自梵蒂冈第二次会议开始，天主教会强调“旅途中的教会”这个角色，虽然“旅途中的教会”这一名词没有在圣经直接出现，于基督教神学传统也不是主流，但却可以成为其中一个反思教会论的模块，到底有甚么圣经基础和神学理念支持？回顾历史，提出“旅途中的教会”时，不同人所理解的“旅途中的教会”是否一致？这些问题都是本文要探索的重点。

圣经基础

如上文所述，圣经中似乎没有直接采用“旅途中的教会”这一名称，但从《创世记》第 3 章亚当和夏娃被驱逐出伊甸园的那一刻起，上帝的子民就一直是一群在旅途中的人。另一个朝圣的标志出现在《创世记》第 12 章，上帝告诉

¹ Stuart Murray, *Post-Christendom: Church and Mission in a Strange New World*. Wipf and Stock Publishers, 2018. <https://www.perlego.com/book/882225/postchristendom-church-and-mission-in-a-strange-new-world-second-edition-pdf>.

² 黃卓恒、麥嘉殷、陳德宜：“狹縫中成為液態教會 趙崇明：有些事可適應但有底線”，《時代論壇》，2023 年 7 月 11 日，

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72047&Pid=102&Version=0&Cid=2141&Charset=big5_hkscs



亚伯拉罕要“离开”他所知道的一切，去到尚未向他显示的地方。这就是朝圣的本质，离开、旅行，最终，抵达。

出埃及记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在旷野漂流等候进入迦南，是另一段上帝百姓“在旅途中”的记述。这趟旅程包括更多的不确定，甚至是失败和挫折，以色列人和十位探子的不信，令整代人要在旷野漂流，但旅途中的挣扎却成为以色列历史的重要时代，成为民族自我理解的重要基础。出埃及记的经验让百姓更肯定上帝的救赎，得到安慰和盼望。以色列的宗教日历以及其仪式和实践都以出埃及记进行重新诠释。新一年定于春季开始（出 12:2）：与自然节奏和土地生活相关的重要农业节庆都在纪念出埃及记中被重新诠释（出 23:14；利 23:42-43；申 16:9-12）。¹

大卫作为一统南北国的君王，但其生平也经历逃亡和漂流，从早期扫罗在位时的流徙，到后其因押沙龙叛变而流亡，关乎大卫的记载因此有不少“在旅途中”的元素。至于整个选民群体，最关键的漂流就是被掳到巴比伦，及后虽然在波斯帝国下得以回归，但整个民族的流散局势已成，犹太人回归故土时面对的挑战（参《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反映他们一直是“在旅途中”。

《历代志上》29:15 大卫的祷文提到：“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将地上存活的日子看成一个旅程。这个说法在新约继续出现，《希伯来书》11:13：“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彼得前书》2:11：“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争战的。”

¹ Nahum M. Sarna, *Exploring Exodus: The Origins of Biblical Israel*, New York: Knopf US, 1996, 2-3.



综合而言，“旅途中”的概念在不同的书卷都有出现，但这个概念却不一定有稳定的元素，出埃及入迦南的旅程是神的带领和管教，而新约称百姓为寄居的，是突出他们与世人的分别，因此彼得前书才告诉他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换言之，圣经赋予“生活如旅程”这隐喻一种基督教的印记。“旅途中”不是一个单一的文本，而是互补且偶尔有差异的经文汇集，不同文本的重点也有差异。或者，“旅途中”的概念本身就带有不确定的因素，因为在旅途中因时制宜会生出变化，所以，这些改变之间也有差异是自然而然的。如果圣经的基础未能为“旅途中”框定一些特有的意义，那么神学的思考会不会让我们对这概念有更确切的把握？

神学理念

在谈论“旅途中的教会”作为教会的一个模型前，可以先看看不同的教会模型，天主教神学家杜勒斯（Avery Robert Dulles）所提出的教会作为体制、奥迹的团契、圣礼、报讯者、仆人、门徒群体的六种模型，以及不同模型的优点与限制：¹

1. 体制（institution）：着重教会结构、层级、权威、传统和圣礼，强调稳定和承继，而不是变革和转化，教牧及圣职人员负责教导和管理平信徒，引领信徒走上成圣之路。这一模型以耶稣立彼得为盘石作圣经基础，令教会有清晰的角色，指引教会如何带领会众。但这一模型难免有机会落入律法主义，过份僵化之后，可能变成威权管治而忽略圣灵带领。

2. 奥迹的团契（mystical body of Christ）：看重教会是敬拜的群体，其中的成员因基督而连结，圣经基础是保罗提出的“基督是头，信徒是肢体”。强调

¹ Avery Dulles, *Models of the Church* (NY: Image Books Doubleday, 2002).



在基督里的合一和互通，令群体成员满有归属感。危机是因没有清晰的架构，容易失去目标，也没有办法处理冲突。

3. 仆人 (servant)：关注社会正义、同理心、爱心、复和及服侍，基于马太福音山羊和绵羊的比喻，强调教会要将神的使命实践在地上，促进信徒将信仰落实在自己的处境，但却有些会变成社会运动，失去信仰的元素。

4. 报讯者 (herald of the gospel)：强调教会首要的角色是宣讲福音和传扬神国度临到，让教会好像旧约先知和传道者一样，将神的启示宣布给普世的人，能够将重心聚焦在宣扬福音，但却可能只看重头脑上的认知，而忽略了实践或圣礼的意义。

5. 圣礼 (Sacrament)：教会成为神临在世界的记号，是神在世界中工作的媒介。这模型让教会彰显神的爱，接近约翰著作经常强调的主题。优点是让教会在神和世界中间有确实美好的见证，但要理解和实践，需要有足够的神学修养和反思能力。

6. 门徒群体 (Community of Disciples)：将教会理解为追随基督的群体，效法基督，以至于死，强调个人及群体承传基督的使命，优点在于跟耶稣及其使命有很强的连结，但可能会太过聚焦在当下的情景，而忽略了普世的向度。

杜勒斯认为以上的模型有互补的作用，而不是互相排斥，每一个模型都反映教会的某一面向，因此，没有任何一个模型可以完全反映教会的实况，唯有透过多个模型，我们才可以较接近教会的本质。

杜勒斯作为天主教的神学家，虽然没有将“旅途中的教会”纳入教会的模型之中，但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里，不少的地方都提及“旅途中”的概念，例如在礼仪宪章 *Constitutio De sacra liturgia Sacrosanctum Concilium (SC)* 中，提到人间的礼仪与天上的礼仪，当中描述“在人间的礼仪中，我们预尝那天上的，



参与那在圣城耶路撒冷所举行的礼仪，我们以旅人的身份向那里奔发，那里有基督坐于天主的右边，作为圣所及真会幕的职司；我们偕同天朝全体军旅，向上主欢唱光荣之曲……”这一部分强调地上的教会是以旅人的身分向天上的圣城奔发，另外，在“教义”宪章中，也提到“今世的教会仍在距离天主甚远的旅途中”、“在现世的旅途中，追求未来永存城邑的新以色列”。换言之，地上的教会乃是“旅途中”的教会。¹

而在教会教义宪章中，也不时提及“旅途中的教会”在现世受逼害的现实：“在世界的迫害与天主的安慰之中，继续着自己的旅程”。宪章第七章更以‘论旅途教会的末世特质、及其与天上教会的联系’为题目。强调地上教会仍然在不断呻吟痛苦，虽然有“圣神的初生果实，却在内心中叹息，渴望和基督在一起”，虽然如此，“旅途中的人和安眠于主内的弟兄们之间的连系不会中断”，“旅途中的基督途的共融使我们更接近基督”，圣徒相通也使我们与基督相连。²

从以上的文献可见，梵二描述地上的教会在地上受苦、与万物一同等待主的再临，但在其中却因为圣徒相通，而可以结连于天上的教会，相信可以连于基督。这些概念或者可以补充杜勒斯提出的六个教会模型：门徒群体除了追随基督，圣徒相通也令地上教会和天上教会连结；另一方面，在旅途中的教会也丰富了教会作为仆人的模型，除了关心社会正义和实践真理之外，教会在受造物未完全得赎之际，仍然是与被造物一同呻吟叹息。最后，旅途中的教会正好修正教会作为体制的模型，不以地上教会某一种模式或结构为必然，而是强调教会在旅途中的变化与更新，让教会有不断蜕变的可能。

如果我们要反思“旅途中的教会”与杜勒斯提出的六个教会模型的关系，除了以“旅途中的教会”为补足上述六个模型的另一种教会模型以外，还可以思考

¹ https://www.vatican.va/chinese/concilio/vat-ii_sacrosanctum-concilium_zh-t.pdf

² https://www.vatican.va/chinese/concilio/vat-ii_lumen-gentium_zh-t.pdf



这个模型与后现代思潮下教会论之间有何关系。参考希利 (Nicholas M. Healy) 提出的“践行先知式教会”论点, 可以看到后现代思潮与“旅途中的教会”的概念有不少可以呼应的地方。¹ 希利受到米尔班克主义 (Milbankian) 影响, 认为要放弃一种现代式的理性主义, 而要接受所有的观察都来自一个有位置和立场的主体, 而观察者因为有自己的神学, 所以, 在分析现有的叙事材料时必然有其神学的立场。

另一方面, 他也受到麦金泰尔 (Alasdair MacIntyre) 的影响。麦金泰尔主张, 我们的观念和理解是在我们历史形成的共同实践背景下形成的, 这些实践塑造了我们的品格和对世界的观点。因此, 人类的理性永远无法脱离赋予其形状的特定共同体情境而被理解。在这样的背景下, 希利认为特定的共同体, 即本地和暂时的教会, 本身就是任何教会学反思的必要情境。

影响希利的第三种理论来自后现代主义人类学, 他将教会传统描述为“教会的拼凑”时显而易见。这个词“拼凑”是由人类学家克劳德·利瓦伊-施特劳斯 (Claude Lévi-Strauss) 首次提出的, 但被德里达等欧陆后现代哲学家所使用, 它指的是文化重新利用旧概念来达到新目的的观念。因此, 拼凑的概念强调了文化或传统发展中连续性和不连续性之间的张力, 并且解释了传统发展中的许多新意。我们已经讨论过希利的民族志提议如何依赖这个想法。他的实践先知性的方法鼓励教会学家拥抱拼凑的动态和创造过程, 并通过“先知性地”分析教会的实践来推进它。在这方面, 希利主张, 当教会在评估自己的情境时, 它不仅是将传统概念应用于新情境中。相反地, 教会从其传统、文化、实践和其他资源中挑选和选择, 并以临时和创造性的方式进行。它构建新的意义, 以适应

¹ Nicholas M. Healy, *Church, World and the Christian life: Practical-prophetic ecclesiology*. Vol. 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自身所处的新情境。正如教会本身的“实践和机构”是拼凑的结果一样，它的“信仰和价值观”也是如此。

总的来说，希利认为所有对教会的理解都有神学向度，所有理解都属乎情境，而所有理解基本上都是创造。“旅途中的教会”这个概念正好可以容纳希利的思路，教会作为在旅途中的群体，是在其独特的情境之下出现的群体，他们的朝圣之旅在地上是未境之路，所以，在过程中必然要不断地创造，这些探索当然也是在教会的神学之下进行。但这些教会论的反思，是否与“旅途中的教会”在教会历史中的实践，特别是过去一、二百年的实践相合？或许就要从教会历史中出现过的“旅途中的教会”开始研究。

历史角度

除了以上提及的天主教会，历史上还有一些群体会称自己为“旅途中的教会”，其中一个例子是美国历史中的五月花号，1620年，五月花号抵达美洲，他们认为当时欧洲的天主教国家腐败不堪，所以要到北美“朝圣”，并在那里建立属于基督的国度。德国学者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提出，“五月花号”的新移民秉持基督教伦理，加上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互相平衡，令美国有强烈的道德感，又有发展的动力，两套价值观都是美国强大的原因。¹

另一个自称为“旅途中”教会的，是20世纪初美国的朝圣洁净教会（Pilgrim Holiness Church）。它是通过合并几个强调个人洁净、成圣和回归早期教会实践的洁净教派而形成的。朝圣洁净教会强调以“朝圣者”或“在旅途中”灵性旅程的旅行者身份生活，朝向天国的旅程，并努力在日常生活中实践耶稣基督的教导。

¹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台北：左岸经典，2008。



朝圣洁净教会最终于 1968 年与韦斯利循道会合并，形成了强调洁净和朝圣教派传统的韦斯利教会。

而天主教仍然强调教会“在旅途中”的本质，2021 年教宗“为旅途中的教会”祷告的祷文提到：“让我们从自我革新开始更新教会，不预设想法，无意识形态的偏见，不僵化，而是从灵性的经验、祈祷的经验、爱德的经验、服务的经验，向前迈进。”而信徒也应该“藉由在日常生活中分辨天主的旨意并在圣神的引导下进行转化”。

天主教神学家柯本纳（Bernard Cooke）指出，“旅途中的教会”的三个特质：一，是教会经历不断改变的环境，身处的每一处都不会是永久的居所；二，是真正在途中的信徒不会安于旅程中的某一个阶段，不会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三，“旅途中的教会”并非漫无目的地游荡，而是朝着它要走的真正道路。¹

为甚么“旅途中的教会”既可以是五月花号这群与当时天主教割切的信仰人的自我理解，又可以同时是天主教自我的诠释？甚至是圣洁运动的自我定位？这三种落实“旅途中的教会”的群体实际上的共通点不多，却都同样认为自己是“旅途中的教会”。究其原因，是“旅途中的教会”此一概念，包括了变化和更新，在任何场景下不断的变化，任何时代寻求自己认为的新方向，都可以被理解成一种新的探索方向。按柯本纳指出的特质，历史上的确可以有持不同立场的教会自称为“旅途中的教会”，再者，若以希利的分析来看，教会一直走在未竟之路上，需要一直摸索，而如果不同时代的人看天上的远景，其实也是要按当下的处境再作调节的话，那么，这种自我的重新理解，就可以出现无限的可能，换言之，没有任何一个基准可以为旅途中的教会设下框架。

¹ Bernard Cooke, “The Pilgrim Church,” *The Way* (1966), 284-288.



如果是这样的话，“旅途中的教会”是不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呢？如果这个观念是如此浮动、人言人殊，教会若以这个模型为根基，会不会把“旅途中的教会”变成一个任人理解和诠释的空洞宣布？

结语

从上文分析可见，“旅途中的教会”的圣经基础，并不指向一稳定的定义，作为教会论的模型，虽然可以补足其他模型的不足，但没有一个核心的内涵可以框定“旅途中的教会”实际指涉甚么，最后，若回顾历史上自我理解为“旅途中的教会”的群体或教会，也看到它们之间的差异可以甚为巨大。“旅途中的教会”这概念虽然符合后现代思潮的胃口，但其流动、多变，不停变化的模式，却令这一概念难以有特定的内涵和框架，易于被不同的立场运用，却不一定在实践层面对教会本质的反省有实质的贡献。

参考文献

Cooke, Bernard. "The Pilgrim Church." *The Way* (1966), 284–288.

Dulles, Avery. *Models of the Church*. New York: Doubleday, 2002).

Healy, Nicholas M. *Church, World and the Christian life: Practical-prophetic ecclesiology. Vol. 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Horton, Michael. *Pilgrim Theology: Core Doctrines for Christian Disciples*.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2011.

Murray, Stuart. *Post-Christendom: Church and Mission in a Strange New World*. Eugene, OR: Wipf and Stock Publishers, 2018.

Sarna, Nahum M. *Exploring Exodus: The Origins of Biblical Israel*, New York: Knopf US, 1996.



梵蒂冈：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礼仪》宪章，1963。

https://www.vatican.va/chinese/concilio/vat-ii_sacrosanctum-concilium_zh-t.pdf

梵蒂冈：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教会》教义宪章，1964。

https://www.vatican.va/chinese/concilio/vat-ii_lumen-gentium_zh-t.pdf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台北：左岸经典，2008）。

黄卓恒、麦嘉殷、陈德宜：“狭缝中成为液态教会 赵崇明：有些事可适应

但有底线”，《时代论坛》，2023年7月11日，

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72047&Pid=102&Version=0&Cid=2141&Charset=big5_hkscs.



The Pilgrim Church: Biblical, Th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Chun LI  <https://orcid.org/0009-0007-6578-8037>

Chinese Theological College Australia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the Pilgrim Church” has regained prominence since 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iblical foundations, theological orientations, and historical applications of “the Pilgrim Church”. While “the Pilgrim Church” differs from other church models, its biblical basis is not sufficient to define it as a stable concept. The historical application of this idea also reveals diverse interpretative approaches, suggesting that this notion a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church still has its limitations.

Keywords: Pilgrim, Pilgrim Church, Church models

DOI: [http://dx.doi.org/10.29635/JRCC.202406_\(22\).0011](http://dx.doi.org/10.29635/JRCC.202406_(22).0011)